

※學術會議※

「正典的生成：臺灣文學國際研討會」紀要

呂淳鈺*

一、簡 述

「正典的生成：臺灣文學國際研討會」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哥倫比亞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中國文化及制度研究中心主辦，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協辦，二〇〇四年七月十五日至十七日於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行。會議分為兩個主題，其一是「臺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論文發表會，共發表十八篇論文、舉行一場座談會；其二是「翻譯臺灣」，共發表一篇主題演講、舉行三場座談討論。本會議的主要命題是臺灣文學在發展的過程中，吸收、轉化外來的文化現象或文學思潮，形成新的風貌；透過考察文學的內部生產機制，兼及文學史、政經發展等等脈絡性的研究，探討文學正典的發生、形成。研究的取向有二，一是探討臺灣文學與世界其他各地區／國家文學的關係；二是探討臺灣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定位與獲取位置的方式。

二、臺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

本會議的第一部分著眼於「臺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由臺灣、美國、日本、大陸、德國、法國等各國學者針對臺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發表論文、進行座談討論。

* 呂淳鈺，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生。

第一場

主持人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歐梵教授，特約討論人為淡江大學中文系施淑教授。共發表兩篇論文：

黃美娥教授（政治大學中文系）：〈文學現代性的移植與傳播：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對世界文學的接受、翻譯與摹寫〉

梅家玲教授（臺灣大學中文系）：〈身體政治與青春想像：日據時期的臺灣小說〉

黃美娥教授的論文以小說的譯介觀察臺灣文學現代性的興起，聚焦於傳統文人對世界文學的接觸經驗，透過傳統文人對於世界文學的接受、翻譯與摹寫的過程，釐清臺灣的文學場域中，如何與外國的語言接觸、引介外國的知識系統，開展出文學現代性的移植與傳播的進程。本論文指出，在日治前期，傳統文人在中國、日本的古典、現代文學之外，已經涉獵了歐洲的文學，如莎士比亞……等等名家作品，並且更進一步進行世界文學的翻譯、摹寫或改寫；至日治後期，反對白話文的傳統文人，如連橫、張純甫等人所開設的書局，也開始販售世界文學書籍，參與了引介文學現代性至臺灣的過程。由此可知，日治時期的傳統文人，在文學現代性的引介過程中，並非完全站在排拒現代的對立立場，其對世界文學的翻譯、改寫，正是與世界文學的交流與對話。而臺灣文學現代性的起源，不應只停留在一九二〇年代的新文學運動，應向前推至日治前期傳統文人所寫作、改寫的通俗小說中所展現的現代性議題。

討論人施淑教授對日治前期「新學」萌生，如李春生等人對於達爾文的天演論方面有所闡述。而科學、哲學上的「新學」，正可與文學現代性的興起作脈絡式的閱讀。黃教授的論文中以為日治前期撰寫通俗小說的作者筆名多用「奇史」、「逸史」之類，是因為可突顯其逸與奇的新鮮感，然施教授指出，中國小說作者向有署「別號」的傳統，用以表明與中國傳統、正統的背離，而非新意的展現。日治時期的小說作者署名為「奇」為「逸」，應為沿襲傳統小說的成規。此外，小說的改寫、創作牽涉到雅俗辯證的問題；通俗文學的「俗」是什麼？是市民還是市井？資本主義的市民與傳統的市井的指涉並不同，臺灣的通俗小說究竟是中國的市井或是資本主義下市民化的「俗」？

梅家玲教授的論文由青春身體以及身體所在的空間來探討日治時期複雜的認同

問題。一九二〇年代、三〇年代的小說中，「東京」及其所代表的日本／都會／異鄉，以及新式教育成爲臺灣新青年認同的對象。即使身在島上，他們都仍然以日本爲「首」，使「首」與「體」呈現分離對峙的現象。在臺灣小說中青少年身體往往呈現病弱衰敝，鄉鎮的青年多半病故，城鎮中的知識青年則多爲結核病所苦。無論是左翼或布爾喬亞意識的青年，都找不到出路。病弱的臺灣青年身體，到了戰爭時期，因應志願兵及徵兵制度而來的種種身心鍛鍊，使之由弱轉強，成爲皇民身體，爲日本流血，這便成爲青年使自己的身體成爲日本人的方式之一。然而談到另一個可能的轉向時，「男性身體」似乎成爲臺灣身體或皇民身體之外的出路之一。

討論人施淑教授指出身體是一種私密的空間，宜用以討論認同的問題。日治時期的東京，對時代的知識青年來說，是洪荒異鄉、或是青春的未來？鍛羽而歸的臺灣青年往往頹廢墮落。在日本帶來的「現代性」、「現代化」下，臺灣人的青春自我的苦惱大都是由於殖民政權而來。另一個問題是，男性身體是否即回到「真正的」身體？李歐梵教授則指出，文學作品中都市青年的結核病，或與歐洲或納粹的傳統有關，可由此推證一九二〇年代以降臺灣新文學與歐洲文學的關係。

第二場

主持人爲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陳萬益教授，特約討論人爲清華大學中文系呂正惠教授。共發表三篇論文：

垂水千惠教授（橫濱國立大學）：〈臺灣新文學中的日本普羅文學理論受容：從藝術大眾化到社會主義 Realism〉

陳芳明教授（政治大學中文系）：〈臺灣文壇向左轉：楊逵與三〇年代文學批評的建立〉

王德威教授（哥倫比亞大學丁龍講座、中央研究院院士）：〈後遺民寫作〉

垂水千惠教授的論文在世界（蘇聯）普羅文學、日本普羅文學的架構下，以日本《文學評論》雜誌的德永直爲出發點，討論臺灣作家對日本普羅文學理論的接受狀況、以及創作實踐。以德永直爲中心是因爲德永創立了《文學評論》雜誌，該雜誌刊登了楊逵〈送報伙〉與呂赫若〈牛車〉，因而可推測德永對臺灣新文學的影響匪淺。一九三三年，德永直援引了蘇聯的 Kirpotin 的社會主義 Realism 當作其理論架構背景，批判過去藏原惟人所提倡的、同時也是日本普羅作家連盟的指導理論「唯物辯證法」是機械的、觀念上的，轉而提倡向大眾生活學習的寫作。一九三四

年成立的臺灣文藝聯盟以及林克夫等人已透過《文學評論》而對社會主義 Realism 的論述有所掌握。郭天留（劉捷）的〈對於創作方法的雜感〉則可能是對臺灣新文學運動中最早對社會主義寫實理論直接加以談論的文章，試圖將此理論導入臺灣的文壇。臺灣新文學界接受社會主義寫實理論，表現在創作上，如呂赫若實際的創作〈行末之記——一個小紀錄〉（又譯〈前途手記〉）、〈身為女人〉（又譯〈女人的命運〉）二篇小說。此二篇類似日本的武田麟太郎的風俗小說，而風俗小說正是武田轉向社會主義寫實理論的實踐。

討論人呂正惠教授指出，垂水千惠教授的貢獻在於釐清臺灣新文學與日本文壇的關係。呂教授質疑德永直是否接受了蘇聯官方的社會主義寫實理論？日本左翼文壇與蘇聯寫實主義的相關性如何？此外，呂教授對於德永直與楊逵、呂赫若的關係有不同的意見，他認為德永直未必完全贊同楊逵、呂赫若在《文學評論》上的創作，因為二人的創作仍然以階級鬥爭為重心；此後呂赫若不再寫階級鬥爭，轉向寫女性等風俗小說，也許是接受了德永的理論，但也許是因為政治空間壓縮，而有寫作策略的轉變。廖炳惠教授提問，左翼理論者或作家對於語言的選擇為何？選擇中文或選擇日文，與他們的文藝大眾化的理論與理念是否有所相關？

陳芳明教授的論文從楊逵的左翼思維方法及其理論實踐的層次，重新檢討其「馬克思主義」內容為何，尋找楊逵的左翼立場在一九三〇年代的文學批評中的發言位置。楊逵在政治運動中堅持的中間偏左的立場，在他三〇年代的文學運動與評論中亦表現出來。楊逵認為階級問題，而非語言的問題，才是鄉土文學的主要內容，把社會主義思考帶入了三〇年代的文學批評中。其階級立場亦表現在文藝「大眾化」的概念的提出，其所指涉的「大眾」，正是勞動者、農民與小市民，具有階級性質。堅持階級立場的楊逵，並不主張機械的、教條的寫作，而認為作者應該具有想像力，具有「說謊的天才」，重視藝術性的看法，是三〇年代文壇的一個突破。楊逵的階級立場與張深切的民族立場不合，於是出走創辦《臺灣新文學》雜誌，即為社會主義的階級路線召喚下的產物。楊逵反殖民的行動既是堅持鮮明的左翼立場、也是支持合法的抗爭，因而成為他自稱的「人道的社會主義者」。

討論人呂正惠教授指出，陳芳明教授的論文具有廣闊的歷史視野，探討了楊逵與三〇年代的文學理論的建構。呂教授認為，楊逵不是共產主義者，他是浪漫的人道社會主義者，因而不適合組織的工作。呂教授又指出，楊逵與《臺灣文藝》的張深切的關係宜更加深入討論，有助於釐清楊逵與其他作家的關係，並且指出其發言

位置與特殊性。

王德威教授的論文由遺民及後遺民的意識著眼，觀察臺灣的文學與文化史；透過追溯明鄭以降的遺民意識，探討現當代的後遺民寫作的生成與影響。遺民是一種與時間脫節的政治主體，其意義建立在合法性、主體性的搖盪之上。遺民文人所銘刻的家國創痛，是臺灣主體建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自十七世紀的沈光文、二十世紀的丘逢甲、林朝崧等人都是重要的例證。而「後」遺民則是一個時代的完了、或者是完而不了，寧願將已遭錯置的時空再錯置的陰魂不散。王教授首先由探討遺民意識的傳統系譜、明鄭的遺民意識。其次指出乙未割臺後的孤臣孽子之音，上承明鄭時期的遺民傳統，被遺棄、割裂成爲文人的重要命題；「現代」又是另一個鄉愁的起點，是「現代」切斷了過去，使人們成爲時間的遺民。然而相較於大清，臺灣的四百萬人是否還可稱爲遺民？因爲割臺而展現遺民姿態暗示，他們已將故鄉僭越而等同於故國了，並且更值得注意的是，洪棄生一輩人甚至化被動爲主動，成爲「棄國」的遺民。乙未割臺後的遺民話語，或許未必對應於清室，而是與明鄭遺民、或廣義的漢族遺民意識相應。最末探討一九四九年以後，二百萬外省遺民來臺，與在地的遺民話語展開對話。新遺民文學到了七〇年代以後，因爲政治結構的轉換，逐漸發生質變。後遺民則是無中生有，書寫想像的鄉愁。朱天心、舞鶴、李永平、駱以軍，他們把失去、匱缺、死亡無限上綱爲形上命題，成爲時間的遺民。後遺民寫作所觸及的命題，正是有關時間、記憶的政治學。

討論人呂正惠教授提出疑問，明鄭、日治時期的遺民（意識），是否得以用來追溯現在的「後」遺民意識？廖炳惠教授則指出，對後遺民作家來說，原鄉失落、不可回歸，是一種放逐，無法真正重建自己的國家。黃錦樹、李永平等作家對於華文世界中的主流國族認同有許多不同的看法，臺灣、馬來西亞都不是他們的祖國；在後遺民的想像中，家國的想像何在？如何對世界文學與臺灣本土的認同進行批判？黃錦樹是一個值得在後遺民脈絡下加以討論的對象。

第三場

主持人爲政治大學中文系陳芳明教授，特約討論人爲臺灣大學外文系劉亮雅教授、清華大學臺文所邱貴芬教授。共發表四篇論文：

張誦聖教授（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Toward a Contextu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Taiwan Literature”

奚密教授（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東亞系）：〈「在現實的傾斜上摩擦的極光」：論臺灣早期的超現實詩學〉

林麗君教授（聖母大學東亞系）：“Women and the Restoration of History: Writing the 2/28 Incident and White Terror”

彭小妍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歷史、虛構與解嚴後眷村作家〉

張誦聖教授的論文為其新書 *Literary Culture in Taiwan: Martial Law to Market Law* 的基本觀念介紹，該書探討文學生產及其具體環境，以及臺灣文學的意識型態及美學。該書引用 Raymond Williams 的霸權 (hegemony)、Pierre Bourdieu 的場域觀，以分析文學場域的結構及個別文學參與者之間的關係。該書由結構性、相對性的位置，宏觀地重新給予臺灣文學新的位置。該書的三個核心問題，其一是文學生產場域中的「美學位置」；其二是文學場域的「自主化」進程；其三是主導現代臺灣文學場域中的合法性原則。臺灣的主流文學是與「中國中心」論緊緊相扣的，藉由布爾迪厄的位置理論，可以發現現當代臺灣文學場域的形構有四個主要的藝術結構 (artistic formation)，包含了由國民黨主導的中國中心論、持自由原則的現代主義者、傾向社會主義的鄉土文學運動，以及附屬於臺灣民族主義的本土主義者。為臺灣文學找出美學位置的方式，使臺灣文學史的研究得以從「分期」的問題中釋放。

討論人劉亮雅教授指出，張誦聖教授此書的理論框架，可以用來研究各種在威權之下的國家的文學。由文學生產、吸引消費的角度來檢視具有廣大讀者的通俗文學，而非已經典律化的文學史。文學放在文化的脈絡來看，劉教授有若干問題與意見，其一是中國中心主義以及本土派，是否可看作是藝術的主體？其二是中國中心主義的對反是否為臺灣中心、或者是鄉土中心論？其三是，本土派美學的具體內容為何？

奚密教授的論文以風車詩社的水蔭萍（楊熾昌）及林修二兩位詩人的詩作與詩論探析臺灣早期的超現實詩學。水蔭萍的詩論受日本前衛藝術的影響，強調詩的本質，在寫實主義的主流之外，反對對現實的模擬或敘述，而是把潛意識的世界表現於夢幻的意象化。他也反對法國象徵主義所追求的音樂美，因為音樂性稀釋了詩的密度。他重視想像、重知性、重詩的強度與密度，最終的目的是為了創造一個嶄新的意義世界。林修二較少詩論文字，而以其詩作作為水蔭萍超現實詩觀的實踐。林修二與水蔭萍的詩中，有不少共同的意象，如追步法國詩人科克多 (Jean Cocteau)

的貝殼意象，以及象徵詩人、夢幻世界的煙斗意象。林的作品以簡單的語言，展現對詩的深入思考以及節制的訓練。水蔭萍與林修二的詩作及詩論在文學史上屬於前衛的實驗性創作，在正典的生成之中，風車詩社尚未被典範化，因詩人／寫作生命短暫、反主流，在重視寫實主義的臺灣文學傳統中並不受重視，然其文本的藝術性，值得進入典範。

討論人劉亮雅教授指出，風車詩社的詩人如林修二、水蔭萍等人，是為藝術而藝術，與三〇年代、四〇年代的寫實主流所主張的為人生而藝術相悖。探討兩位詩人的詩作與詩論，或可由其寫作年代、學習背景來看，林修二是慶應大學英語系畢業，對於西方的超現實主義的傳統應該有所接觸。劉紀蕙教授指出，楊熾昌的詩作或詩論是由歐洲位置回頭想像臺灣的熱帶風情，因而有對南國／島國的諸多想像，與寫實主義的傳統之下寫臺灣的方式不同。

林麗君教授的論文討論臺灣的暴行、浩劫文學，以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為主題的作品為中心，探討女性在暴行／文學當中的受難經驗與形象，並且將臺灣的受難文學放在世界文學的座標上觀察，以世界文學當中的暴行文學，如猶太人屠殺的浩劫文學作為參照。女性在國家論述當中，往往處於邊緣的位置，更常是國家的劫難當中遭到忽略的雙重受難者。本論文指出在臺灣，女性的角色在暴行行為當中往往是缺席的，然而，女性在歷史中缺席的存在卻能夠完成重建歷史的重要任務。如陳映真〈山路〉中的贖罪的蔡千惠、林雙不〈黃素小傳〉瘋狂的黃素等等。一般臺灣的暴行文學當中，女性的角色總是天真無辜的，而在李昂的小說中，女性角色則是共產主義者，重新質疑了受難的意義。例如在小說中，如果女性角色不是因為丈夫被逮捕，就不會成為受難者；然而也因為她成為受難者的身分，使她得以獲得許多其他臺灣人所無法得到的政治資源，小說展現了受難的多種歧義。

討論人邱貴芬教授指出，林教授的論文在世界文學的大框架底下看待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文學，具有新的視野。然而將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三篇小說放在一起討論，是否合適？邱教授又指出，女性的受難，是因為「事件」而受難，或者是因為沒有辦法說話而受難？女性沒有辦法發聲的痛苦，是無法自我再現的痛苦。邱教授且對林教授論文當中指控楊照是以男性作家的遐思幻想來寫女性角色，而未必是為了解省籍問題的說法，是否將敘事者、人物以及隱含作者的意見相混。

彭小妍教授的論文指出解嚴之後重要眷村作家的實驗小說特質，以後現代的文學技法挑戰歷史的本質、寫實主義的成規，以及敘事的合法性。眷村提供了復國歸

鄉的夢想，如三三集刊的朱天文、朱天心姊妹的作品中，充滿對故國中國的戀人式愛戀嚮往。蔣介石的死及解嚴代表復國「神話」的崩盤、象徵對祖國中國信念的喪失與時代的終結，與世隔絕的眷村中的居民發現自己的族群竟成了島上的外人，內部的流亡者。而正是這種狀態，使眷村的作家能以批判的眼光檢視自己和過去政權的統一神話，質疑新興的獨立神話，以反傳統的語言和文學形式進行敘事。本文以眷村作家朱天文、朱天心、張大春等人的作品為主，指出他們的作品以後現代的意識重新解讀、建構歷史，彰顯歷史「以想像重建過去」的本質，並且對小說敘事的本身也提出質疑，同時顛覆寫實主義的傳統，模糊小說與非小說（論述）、虛構與現實的界線，表現出典型的後現代文學手法。而歷史、小說或生命遂在後現代的技法中消解，只剩下語言與書寫。

討論人邱貴芬教授指出同為眷村小說，張大春與朱天心處理虛構與真實的議題手法並不同，同樣是以假當真的敘事態度，張大春〈四喜憂國〉的虛構是荒謬的，而朱天心〈古都〉中的虛構卻是建設性的、積極的。邱教授並且提問後現代意識或手法是否是眷村族群的特有寫法？

第四場

主持人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彭小妍教授，特約討論人為臺灣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柯慶明教授。共發表三篇論文：

黎湘萍教授（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經典構成的因素：從白先勇、王文興到張大春〉

李爽學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括號詩學：從吳爾芙的《戴洛維夫人》看白先勇的〈遊園驚夢〉〉

Christopher M. Lupke 教授（華盛頓州立大學）：〈談諧與（政治）潛意識的關係：解讀王禎和的本土幽默及全球憂慮〉

黎湘萍教授的論文藉白先勇、王文興及張大春三個個案，探討臺灣文學經典構成的種種因素。經典一方面是具有超時空性的，然而其生產過程是歷史化與地域化的過程。本論文討論白先勇與王文興的作品經典化的過程，並且以尚未經典化的張大春作旁證。白先勇與王文興，他們認為文學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創造一個更為永恆、更為真實的藝術世界，超越生活的現實世界，因而文學是對抗政治權力的另一種力量、對抗時間的另一種時間。白先勇與王文興的小說刻意營造小說的藝術世

界，強調與現實、歷史的區隔；而張大春則建立了一個與現實既有密切關聯、卻又純粹的藝術世界，刻意破壞傳統文體之間的界限，揭示了真實感的產生過程，並且揭示其虛構性。

柯慶明教授指出，黎湘萍教授的論文肯定了白先勇、王文興等人的經典的歷史性，並非超歷史性；白先勇、王文興等人的時代過後，就應該交給張大春了。柯教授認為，經典的歷史性，是將經典放在其所處的時空中理解，而在那個時空之後，還能夠作為後來的照明。

李爽學教授的論文，由比較文學的角度討論吳爾芙的《戴洛維夫人》對白先勇〈遊園驚夢〉的影響。向來談論《臺北人》當中的諸篇名作，多追溯喬哀斯的《都柏林人》的影響，然而與吳爾芙的小說的關係並無人論及，本論文則由白先勇先生的演講中得到啟發，一探錢夫人與戴洛維夫人之間的因緣。白先勇與吳爾芙都以意識流的方式來寫作錢夫人或戴洛維夫人的憶往，跨接不同的時空、拼湊小說人物的歷史，兩位夫人都回味著舊情新歡。吳爾芙小說中戴洛維夫人與瘋子西提摩士作為一個心靈的內外兩面，正似〈遊園驚夢〉中的平行結構。《戴洛維夫人》中每敘及人物的內在獨白與自由聯想時，便以括號的方式講述全知敘事者所無法說明的部分；〈遊園驚夢〉亦有相仿的括號詩學。白先勇與吳爾芙對於意識流美學之間的聯繫，成就了〈遊園驚夢〉的寫實主義與美學的登峰造極。

柯慶明教授認為，〈遊園驚夢〉對括號的處理與吳爾芙也許並不那麼相近，更為接近的應該是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柯慶明教授認為，〈遊園驚夢〉的小說中的括號正是心中真正的想法。南京的那場宴會，錢夫人失聲之後，到臺北的這場宴會，成為真正無聲的、無言以待的角色。在《牡丹亭》中，對杜麗娘來說，愛、情感上的永恒結合，才是真正活過的證明；錢夫人比杜麗娘悲慘的是，她只有情欲上的結合，而無法獲得情感上的永恒。

陸敬思 (Christopher Lupke) 教授的論文藉 Fredric Jameson 與 Freud 的理論，來探討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當中的幽默諷刺話語作為對全球化影響及一般百姓意識的批判。當以「本地老百姓」為挖苦諷刺的對象的時候，王禎和如何能夠稱得上是一位對下層的小人物擁抱同情的鄉土作家？這可能是因為作家對臺灣特殊的歷史狀況的關心及解決之道：在大漢文化與大閩南文化之間，王禎和選擇了以去中心的方式，避開了選擇或拒絕統一或獨立的兩極選項。王禎和把本土的幽默與對全球化的憂慮作一對比，他嘲弄了小說中的所有人物，包括知識階層、政治人物與下層

行業角色。作者用大量的半國語半閩南語的語言，造成了一種社區感，一種只有充分理解當地文化的人才能了解的文本。作者找出許多可笑的語言用法，來表示它的「有效期限」，敘述者的重點是，人人都受到時間和歷史的限制，沒有人能夠超越時間。

柯慶明教授認為陸敬思教授指出一個重要的問題，也就是王禎和似乎嘲諷了每一個小說中的人物，不帶同情的口吻，是否稱得上是關懷鄉土的作家？柯教授認為王禎和是否是鄉土作家還是一個有待討論的問題。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所諷刺的對象當中，沒有一個是真正的小人物；他所諷刺的主要是兩個剝削者，其一是玫瑰——也就是美國、越戰等等；另一層是對知識分子，如教師、律師、牧師等等臺灣社會的上層人物的諷刺。此外，王禎和在此一作品當中還尚未明顯表達，之後在《人生歌王》當中指出的是對大閩南主義的諷刺。柯教授並且補充說明《玫瑰玫瑰我愛你》當中董斯文愛用的詞彙「的相反」，可能是從日語的語法中轉變而來，而且亦像是臺灣兒童的遊戲，是以一種遊戲的態度來看待董斯文這類人物。

第五場

主持人為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系藤井省三教授，特約評論人為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廖炳惠教授、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張逸帆教授。共發表三篇論文：

Edward M. Gunn 教授（康乃爾大學亞洲研究學系）：“Local Language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Media and Literature”

紀蔚然教授（臺灣大學戲劇系）：〈故事該怎麼說？比較《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與《記憶相簿》〉

周慧玲教授（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菁英論述與官方政策的共生與悖離：臺灣現代劇場論述的跨文化挪用問題初探〉

Edward Gunn 教授的論文探討臺灣的電視、電影、文學、廣告等等不同的傳播媒介當中，臺灣本土語言運用的情況，透過幾個重要的媒介／文化事件，指出臺灣的本土語言如臺灣閩南語及其他方言的文化位階在幾個不同的歷史階段的轉換，指向了以本地企業團體為主的中產階級的向上爬升。本論文指出，臺灣企業團體的崛起，促成媒體使用本土語言的風潮，並且使臺灣的社會呈現出語言多元主義的特質。一九八〇年代以前的媒體當中幾乎是完全沒有本土語言，如果有也常常是用以表現鄉村的、未受教育的、未工業化的、私人的形象；而相較於國語則是受教育

的、都會的、正式的語言。而一九八〇年代以後的幾個文學、文化事件，如一九八九年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或是「黑名單工作室」樂團的出現，則代表了臺灣本土語言位階的上升，指向臺灣文化多元化、本土化的成果。

討論人廖炳惠教授指出本論文扣緊臺灣的政經文化脈絡，指出臺灣在全球化之下，中產階級向上爬升的結構，而臺灣閩南語也由低到高的位置轉換。本論文集中心討論城市裏，尤其是臺北市的中產階級，然而事實上臺北與鄉村之間對於語言使用的不同，亦值得討論，尤其是多元自由主義在臺灣的展現。此外亦應考慮階級的面向，「方言」或通俗語言的出現，與殖民、城鄉、階級的資源不平等、族群內部的分裂與差異有關。臺灣在 fatherland 中國、motherland 日本的勢力之下，有太多的 landlord，這些祖國、母國的文化對臺灣的多元文化均有深刻的影響。

紀蔚然教授的論文以後結構主義的敘述學理論來閱讀、比較兩個戲劇文本，為理論與戲劇搭起對話的橋樑。本論文首先探討一九二一年皮藍德羅的《六個尋找作家的劇中人》，此劇將兩種風格、美學、意識型態的劇場並列，讓它們進行辯證對話，可以看作是後設劇場的先驅，以一齣戲劇對劇場的各種面向進行探討。在《六個》一劇中，呈現了一個相對的世界，懷疑真理與現實的可能，然而透過語言，卻也直接表明某個人物說的才是對的，此劇的多重敘述，最終落在某個具有優越性的中心位置。二〇〇〇年周慧玲自編自導的《記憶相簿》則是一齣有關敘述與記憶的舞臺劇，全劇是一個關於敘述的敘述，與《六個》一劇相同的是同時呈現了真實人物與虛幻人物的並置。不同的是，在《六個》中真實與虛幻是截然二分的；在《記憶相簿》中，真實與虛幻的界線模糊，敘述反而召喚出更濃的雲霧。在《記憶相簿》中，沒有一個家庭成員是可靠的，形成各自表述的自戀者。《六個》雖然具有後現代戲劇的雛形，終究還是完整而成為「未完成的後現代」；《記憶相簿》則是因為其不完整與未完成，更具備有後現代戲劇的特質。

討論人張逸帆教授指出，本論文結合了向來各自為政的理論與戲劇，深入討論戲劇文本的敘述特質。張教授認為《六個》一劇就是現代劇場，因而其後設手法的未完成是在現代劇場的範疇中演出的結果；《記憶相簿》則是後現代劇場，因而能夠完成未完成。紀教授在論文中未處理文本與身體演出的對話，是值得更進一步討論的切入點。

周慧玲教授的論文針對八〇年代以來臺灣現代劇場論述裏的幾個現象，包括精緻與通俗、論述與政策、抵制與收編、身體與文本的二元對立論述進行討論，並且

透過臺灣身體劇場的影像資料見證臺灣八〇年代以來劇場的實踐面向。一九八一年行政院文建會成立以來所制訂的各表演藝術補助制度，其政策制訂與言說受到美國國家文藝基金會的影響，重視精緻文化；民間的菁英人士亦主張精緻而完美的藝術，官方的論述立場與民間似乎是共生的。然而在精緻藝術的論述之下，受到官方補助的實驗性劇團，卻往往因為獲得鉅額的補助款而得以與影視演員結合，而產生了商業、營利性質的大型表演，於是部分臺灣現代劇場遂走向通俗化。另一方面臺灣劇場界的主要論點因為受到歐美及日本前衛劇場的影響，始終唯小獨尊，反對商業劇場及附屬於文學，而使臺灣劇場向小劇場傾斜，並且認為抵制與顛覆才是藝術。由是，產生了劇場是否接受政府補助而被收編、或者維持繼續抵制的困境，以及身體劇場與文學劇場的辯證，以身體作為顛覆主流的主要策略。

討論人張逸帆教授指出本論文對臺灣的現代劇場進行宏觀的檢討，同時以劇場人的身分期待臺灣劇場論述得到成熟的發展。周教授的論文主要著眼於臺北的劇場，然而臺灣其他各地方還有許多非臺北觀點的劇場論述與實踐，例如臺南人劇團以臺灣本土語言表演西方的戲劇（莎士比亞劇作）；忽視了臺灣本身的異質性，臺中、臺南、臺北等地劇團的不同發展。此外，論述與表演未必在同一個平面上發展，因而戲劇創作與論述並不一定要相符，臺灣劇場的論述未必能影響創作的實踐。

第六場

主持人為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劉紀蕙教授，特約討論人為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朱偉誠教授。共討論三篇論文：

陳綾琪教授（華盛頓大學）：“Embodying ‘Difference’: Postmodernism, Postcolonialism, Globa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Taiwan Literature”

阮斐娜教授（科羅拉多大學）：〈流轉，遷移與文化認同：東亞（後）殖民地文學中之女性主體書寫之諸問題〉

桑梓蘭教授（奧勒岡大學）：〈同志小說：游離於臺灣經典邊緣的雜種文本？〉

陳綾琪教授的論文為「臺灣文學」在世界文學當中尋找位置，指出在後現代、後殖民、全球化的國際狀況中，臺灣文學突出其差異的後殖民，尤其是後現代的性質，或許能在國際當中得到位置。臺灣文學一九八〇年代以後的主要特質是自覺

地、大量地模擬、挪用西方的後現代的敘事技巧與美學、後殖民的理論，以及拉丁美洲的後殖民書寫。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主義對臺灣作家來說，代表了典範的轉移，從現代的辯證法到後現代的權力多重母體、從殖民統治到全球去殖民化。後現代與後殖民對臺灣文學發展的影響可以歸結為「差異」。而在全球化的影響之下，臺灣的現當代文學如果被標誌為後現代文學，更能與世界的經濟發展及文化網絡同步。因此也許後現代比後殖民更適合於標誌臺灣文學的性質，並且也更能使臺灣與西方世界關係更密切。

討論人朱偉誠教授指出，後現代與後殖民在西方有激烈的爭論，直接用以標誌一九八〇年代以後的臺灣文學是否適用？陳教授的論文缺乏文本引述，也缺乏島內論爭的引述，如邱貴芬等人討論臺灣的後殖民狀況的論文。本論文的貢獻是從全球的、而非在地的觀點，以後現代標誌臺灣文學。然而後殖民並不一定比後現代更不適合標誌臺灣文學，進而在西方世界推廣。然而因為臺灣奇特的殖民經驗，遭到非第一世界國家的殖民，與過去被西方第一世界國家殖民的狀況不同。此外，陳教授所提出的「差異」、「雜種」的特質，亦可在島內的論爭當中觀察。

阮斐娜教授的論文以臺灣日治時期臺日文化文學交流為中心，探討臺灣文學與世界（特別是日本）文學的關係，透過女性書寫過程及其文本分析探討性別與殖民主義的互動。本論文集中在兩位日籍女作家真杉靜枝與坂口零子，探討女性作家在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對殖民主義的看法與批判，特別著重於女性性別和身體與帝國的交錯，以探討女性身體、書寫主體與殖民主義的脈絡。無論是脫離殖民地的真杉靜枝或受殖民地誘惑的坂口零子，臺灣成為他們共同的文學表現媒介。真杉靜枝的「脫臺」與坂口零子的「入臺」，都可以看到女性與殖民交流的狀況；他們以極私密的個人經驗，真杉以一己的身體介入帝國文壇，而坂口則動員女性身體來回應帝國的召喚。

討論人朱偉誠教授指出本論文透過有殖民地經驗的作家來討論殖民地女性主體書寫的狀況，並且以戰後未親身參與殖民經驗的後殖民作家李昂與柳美里相對照，以釐清在帝國與殖民地之間流轉的文化認同。其貢獻是聚焦於向來能見度較低的女性作家作品之上。朱教授認為，亦可以比較的觀點，由更大的脈絡來探討殖民地臺灣文學在日本的主流意象當中如何？例如文學獎的分配等等面向，來探討性別是否是重要的差異因素。此外，本論文所舉李昂與柳美里作為對照，然而對日本文壇來說，李昂是外國作家，柳美里雖為韓裔，仍為本國作家，面對後殖民的情境時，兩

位作家以及日本文壇或有不同的態度。

桑梓蘭教授的論文在思考臺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時，跳出「國家文學」的思考模式，或者能夠以同志文學這一具有全球化特徵的文類，在跨國家的全球文學中占有一席之地。左右當前臺灣文學經典的認定與建構的因素，很大一部分是分裂的國族認同問題，而尋找「世界文學」脈絡下的臺灣文學，或者能夠成為多族群、多文化特質的開放性與雜種性的詮釋架構。另一方面，同志文學雖然在九〇年代以後橫掃各大文學獎，然而，卻無法進入臺灣文學經典的範疇內，尤其是同志文學在美學上的放肆、異端，在題材上的個人主義與都會色彩皆使之與重視正確的國族認同與本土特質的正典背離，被排除在強調鄉土、民族與社會寫實主義的正統之外。九〇年代以降的同志小說與西方及日本的文學之間有綿密的交流網絡，而使之融入全球文學的範疇，具有複雜的互文關係。為此，臺灣的同志文學在臺灣文學經典的排拒之外，或者可以在跨國、跨文化的全球文學架構下獲取一個位置。

討論人朱偉誠教授指出，全球化的文學可以取代國家文學的位置，國家文學很難吸納同志文學，即使是西方世界亦是如此，如果要進入經典，就要去同志化。臺灣不論是統、獨的經典選拔，皆反對同志文學，因為正典本來偏向主流、偏向共識，並且與國族立場有關。國家文學排拒同志文學，則同志文學應向全球化、世界文學靠攏，因為同志本來就有向全球認同的傾向，然而也可能遇到東方同志文學被東方主義化的可能。同志議題可以容易打入國際，與國際接軌，因而同志文學未嘗不是臺灣與世界接軌的一個出路。劉亮雅教授指出，聯合報系的臺灣文學經典選拔與建國運動的脈絡正好相反；此外，桑教授指稱獨派與同志的互斥並不成立，例如自立報系的百萬小說大獎，正好頒給同志小說《失聲畫眉》。

座談會：臺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

主持人為王德威教授，引言人為 Edward M. Gunn 教授、Christina Neder 教授（德國波鴻魯爾大學）、Isabelle Rabut 教授（法國國家東方語文學院）、Angel Pino 教授（法國波爾多第三大學遠東研究中心）、藤井省三教授、張誦聖教授、黎湘萍教授、劉紀蕙教授。

座談討論會中有若干重要問題與討論，涵蓋了臺灣文學的文類、疆域、教育、語言、翻譯、政治等等議題。

Edward Gunn 教授指出，臺灣文學因為使用多種方言或者文言，很難在翻譯中

如實呈現；方言與「國語」對外國的讀者而言，是一種語言與另一種語言的關係。而大眾文化的文本比經典文學文本更能夠接受或運用具有多重來源的本土語言。Christina Neder 教授指出，首先應該探討國家文學、臺灣文學與全球化文學／文化的關係。在加入 WTO 之後，臺灣出版界成爲世界大眾出版的一環，則「國家文學」的概念是否會消失？「臺灣文學」面對全球化的問題時應該如何自處？Angel Pino 教授與 Isabelle Rabut 教授指出，中國注重與外國的關係，對外國的依賴很強，一定要與世界文學接軌的企圖，藉世界文學以擺脫公式主義的傾向，透過現代主義的荒誕來討論仍受壓抑的政治議題。而臺灣文學相較之下較爲內傾、內向性強，關心自己的特殊經驗，例如殖民地、眷村生活，著重於個人或群體從幻想到幻滅的心理。臺灣作家是對自己講話，總結自己的過去與現在，回憶同一代人的心理，進入獨立的、自主的階段。但對外國人來說很難理解這些內向性的書寫，似乎切斷了與外界的關係，因此，在外國就要教育不懂臺灣的讀者來讀懂臺灣。藤井省三教授認爲日本目前對於臺灣文學介紹的工作做得不錯，但是距離理想還遠。他認爲應該把臺灣文學放在華語文學的脈絡中，華語文學在亞洲及在世界都有非常重要而令人尊敬的成果，臺灣的作家也因此受到重視，而這正是日本的研究者在推行臺灣文學的成果。張誦聖教授則認爲如何在全球化之下推廣臺灣文學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如何與國際接軌、如何與中國競爭？她指出臺灣電影可與文學的推廣相輔相成，推廣的是文化脈絡的層面，而非單單只是文學。黎湘萍教授認爲臺灣文學研究的重要問題是劃地自限，應該要跨越疆界，突破國界、意識型態、學科的局限，成立臺港澳文學研究中心，聯合各地的研究者，方爲臺灣文學研究的出路。劉紀蕙教授指出，當研究「臺灣文學」時，常常會相信文本所陳述的是真實的，而忽略構成文本的文化脈絡；文學研究者所應該進行的是思考文本的構成邏輯，討論文化心態史如何在文本中呈現、思考知識體系如何反應在文藝理論中，發現臺灣文學如何爲世界所構成。

三、翻譯臺灣

本主題共有一場主題演講、三場座談討論會，針對臺灣文學的外譯及推廣問題進行討論。

主題演講

瑞典皇家學院院士馬悅然教授主講〈論翻譯的藝術〉。馬教授認為譯者應該比作者更具備有語言學理論的能力。維根斯坦認為語言限制了人們對週遭世界的理解，翻譯時會面臨語言的不對等性的問題，也就是原作與譯作的兩個語言系統是無法全然相等的，因而譯者如果堅持要把原文的每一個字都譯出來，就會有過度翻譯的問題。喬治·史坦那認為譯者應為原作服務，是一種自我否定的工作，不能伸張自我；然而翻譯是一種詮釋、受到許多主觀性與脈絡性的因素影響。譯者不應只是自我否定、作為作者的奴隸；他應該也是演員，模擬原作，以最為神似的方式表演出來。通過譯者的詮釋，譯作的可讀性、文學性甚至會超越原作。對馬教授來說，翻譯就像是愛情，這種愛情必須同時對原作者與譯文的讀者負責。馬教授從事翻譯時，喜歡反覆默誦原文，直到一天結束時，往往口乾舌燥。而透過反覆默誦，可以發現未發現的意義。譯者的任務，不僅僅是翻譯文本，而且還是翻譯文化，翻譯就是文化溝通。

座談會

第一場

本場座談會主持人為臺灣大學名譽教授齊邦媛，引言人為李歐梵教授、Jennifer Crewe 女士（哥倫比亞大學出版部主任）、Howard Goldblatt 教授（聖母大學東亞系）、John Balcom 教授（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本場座談會的主要議題是臺灣文學的翻譯與出版問題。Jennifer Crewe 女士指出對出版部而言，出版翻譯作品最重要的是資金來源、市場銷售及譯作品質的問題。哥倫比亞大學在一九五〇年代開始，為了教學的需要而開始出版亞洲的古典經典英譯本，七〇年代開始增加現代文學的系列。近十年來因為王德威教授的大力促成，以及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支持，哥大出版部開始進行臺灣文學的翻譯工作，目前已出版十部小說，以及奚密與馬悅然合編的現代詩集。最近的出版計畫是齊邦媛主編的《最後的黃埔》短篇小說集。這些翻譯出版，贏得不少獎項，然而這些出版品的主要購買者是研究者與學生，對商業出版社而言，在銷售上要冒很大的風險，因而出版的意願降低。哥大出版社這一系列臺灣文學翻譯，可以說是作者、譯者與出版社合作的心血結晶。Howard Goldblatt 教授討論臺灣文學的英譯問

題與前景，提及譯者的忠誠度與責任問題，作品、譯者與出版社的選擇問題，然而最重要的還是資金的問題，這是影響層面最大的問題。

第二場

本場座談會主持人為王德威教授，引言人為 Christna Neder 教授、Isabelle Rabut 教授、Angel Pino 教授、藤井省三教授、黃英哲教授（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討論有關臺灣文學在各國的翻譯情形。各國的翻譯與出版所面臨的問題都很接近，讀者限於學術界人士，無法在商業書市獲利，因而需要基金會或政府機構的資金挹注；其中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提供了最大的補助，讓臺灣文學能夠在國外獲得翻譯與出版面世的機會。

Christina Nedar 教授使用數據表格顯示了近三十年來在德國的臺灣文學翻譯。臺灣文學的德語翻譯，除了單行本之外，還可見於文學期刊上，翻譯頻率最高的是白先勇、黃春明、葉石濤與張大春的作品。已故的馬漢茂教授對臺灣文學德譯貢獻良多，他編輯許多譯作，鼓勵學生以翻譯臺灣文學作為他們的博碩士論文。

Nedar 教授並且由「副文本」(paratext) 的角度，透過書名、書系、出版社、廣告文案、前言、結語、導論等等觀察臺灣文學在德語世界的翻譯與推行的情況。德語世界中，臺灣文學仍屬於學術領域的讀本，而無法進入商業市場，銷售最好的是李昂的《殺夫》及林海音的傳記。在出版物的書名、文案當中，「臺灣文學」一詞很少出現，通常被當作是「另一種中文文學」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中文文學」。選擇翻譯的作品，多半被視為反映臺灣或中國的社會現實或者是政治史的表述。如此並不能在美學層面上使臺灣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因此，未來努力的方向，可以放在推動臺灣文學的文學性與作為世界文學中普遍價值的認識上。

Angel Pino 教授與 Isabelle Rabut 教授指出，在法國，中國當局對於其文學的推廣不遺餘力；臺灣的推廣也必須依靠國家機關的資助，不論是來自法國或者是臺灣。法語世界對於臺灣文學的翻譯，主要集中在小說，共有十二部長篇小說翻譯出版，五十七位作家作品，最多的是李昂與白先勇的作品，《殺夫》與《臺北人》均有再版，然而並沒有戲劇的譯作。法國讀者關注的是中國的社會、政治暴力的問題、異國情調、以及東方國家面臨現代化衝擊下的衝突；臺灣的作品往往不同於此。臺灣文學能夠受到歡迎的，都是具有全球普遍性的議題，如李昂《殺夫》的女

性主義議題，或者是白先勇的小說中的同志世界。

藤井省三教授指出，在日本，臺灣文學的翻譯自一九七〇年代開始就有不錯的成績，然而最早受歡迎的作品——黃春明的《莎喲娜拉·再見》是因為其中觸及到日本戰後的社會問題——集體到東南亞買春的批判，而促使日本人產生興趣。真正建立日本讀者與臺灣作家之間的關係，進而透過文學作品發現臺灣的，是李昂的文學作品被翻譯至日本。一九九三年由藤井教授翻譯的《殺夫》，在日本引起很大的迴響，因為書中女性受到歧視的問題，在日本亦能引起讀者的共鳴。李昂的作品在日本的發行，文建會的補助功不可沒。在此之後，日本的臺灣文學翻譯逐漸熱絡起來。臺灣文學在日本雖然獲得不錯的口碑，但是銷售數字卻不盡理想。藤井教授認為應該多透過學校管道或公開講座介紹臺灣文學，並且透過報紙、雜誌等媒體為臺灣文學積極造勢。在日本，臺灣電影具有獨特的藝術地位，也許可以透過小說改編的電影的放映來宣傳臺灣文學。

黃英哲教授自一九七〇年代譯介臺灣文學開始，回顧了日本的翻譯與研究的狀況，指出臺灣文學在日本雖然銷售量並不高，但是頗受純文學精英讀者群的重視，如朱天心的《古都》譯出後獲得許多正面評價。原住民小說、現代詩等等作品亦在日本翻譯出版，成果豐碩，在日本知識界已有一片天。藤井省三教授、下村作次郎教授及許多臺灣、日本學者在翻譯介紹臺灣文學時，不但沒有版稅，甚至自掏腰包為臺灣文學宣傳，這是臺灣文學在日本獲得一片天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場

本場次為作家與譯者的對談，主持人為彭小妍教授，參與的作家為鄭清文先生、李喬先生、楊牧先生、黃春明先生、李昂女士、朱天文女士、朱天心女士，參與的譯者有 John Deeney 教授、Nicholas Koss 教授、Daniel Bauer 教授、奚密教授、杜南馨教授等人，針對創作與翻譯進行討論。

本場討論有若干引發眾多討論的議題。有關本土方言翻譯的問題，黃春明先生認為翻譯的潤飾有時比小說本身更優美；其小說中的本土語言，有時在翻譯之下，往往太過文雅，如日本的譯本，或許日文譯本在譯臺灣小說的方言時，可以將之譯成日本的方言。垂水千惠教授回應黃春明先生的論題，指出自己就是黃春明小說日文的譯者之一，然而日本各地的方言不同，很難特別選擇一種作為臺灣本土語言的譯語，黃春明先生則認為可以選擇一種較為普遍的方言。

有關「臺灣文學」的獨特性或能見度的問題，朱天文女士認為臺灣與中國文學的分別在於中國的小說題材故事性很強，而臺灣幾乎已經是城市無故事，在形式上與內容遂向深處走；臺灣文學的另一個重要性在於中文的傳統未曾斷絕，所以能夠寫出更為精準的中文，而加深了翻譯的難度。朱天心女士則認為，能夠支撐臺灣文學之所以被翻譯的理由，是在面對現代化的問題時，臺灣是中國的一個可能的參照點——相較於中國在鴉片戰爭以來，現代化伴隨災難而來，臺灣的狀況無疑更平順一些。臺灣文學在華文寫作當中，是與現代化的遭遇戰中的前鋒，這是臺灣文學的特色，值得被翻譯的原因。李昂指出在巴黎書展的經驗，臺灣文學在巴黎書展中是被置於「華文文學」的標題下，與馬華、中國文學並列，將華文文學看成一個共同體，或者是臺灣文學能見度提高的方式之一。

「正典的生成：臺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閉幕式由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朱雲漢教授主持，齊邦媛教授應邀致詞。齊教授表示，這是一場有感情的會議，見證了臺灣文學的獨特性與豐富性，作者、譯者與學者共同努力的成果。一九六〇年代至一九八五年，全世界只有臺灣有純文學的中文作家與作品，這些作品與翻譯都能夠留名、傳世，成為未來的世世代代尋根的根源。本會議以「世界」的角度看待臺灣文學，開拓了研究與寫作、翻譯的新視野。